

目 录

前言

遂宁棉场始末	幸继铃 (1)
遂宁直接税办理情况概述	倪 镇 (5)
民国时期射洪的货币贬值	张崇福 (7)
遂宁城关中西药行业概况	贾俊祥 (12)
老药工漫话今昔	唐国卿 (16)
遂宁白芷简介	贾俊祥 (22)
遂宁白芷之最	贾俊祥 (23)
古器牌蓬溪姜糕	刘新尧 (24)
遂宁解放前的党团概况	黄德寿 (25)
打十二区专员公署纪实	李国梁 (29)
我所知道的遂宁特委会	李运焕 (32)
四十年代遂宁的新闻活动	庄济华 (37)
遂师学潮	吴逢春 (42)
《阿Q正传》第一个法文译者——	
敬隐渔先生	刘新尧 (45)
李青芝先生轶事	李朝德 (48)
目睹“五三”“五四”重庆大轰炸	吴汝成 (52)
“打叉”绝技闻录	敬永林 (56)
广德寺历史沿革考	许伯文 (60)

封面题字 冉永辉

本期编辑 杨杰明、刘安治、周立

印刷单位 遂宁市印刷厂

遂宁棉场始末

幸继传

原遂宁棉场设在遂宁河东棘子坝，成立于1936年。初名“四川省立棉作试验场”。后改为“四川省农业改进所遂宁棉业改良场”，当地简称“省棉场”。1949年底解放后，由军管会军代表刘安治接管。后交川北行署，仍就原场址成立“川北行署遂宁棉场”（后来又受西南军政委员会农林部领导），简称“遂宁棉场”。同时川南行署就原遂宁棉场所属的简华推广区在简阳另成立一个棉场，简称“简阳棉场”。1953年底，为了便于省领导的督促检查，将遂宁棉场合并于简阳棉场，场址设简阳。即现今的“四川省农科院棉花研究所”的前身。从此全省棉花科研工作，统一由省农科院棉花研究所主管了。

解放前后两个阶段遂宁棉场的组织、人员及业务情况如下：

解放前的遂宁棉场分场本部及场外两部分，场本部设场长办公室及技术、推广、总务三个股，有场长一人，三个股各有股长一人，场外除设奉节区域试验场外，在全省主产棉县及次产棉县（或新棉区）分别设置植棉推广区（原先叫植棉指导区）约10个左右。区下又设办事处，负责良种示范繁殖及技术推广事宜，各区有主任一人，工作人员若干人，全场职工人数约为100人左右（包括试验工人在内）。技术职称有技正、技士、技佐、技术助理员等名称。（后勤方面有事务员、事务助理员等。）历任场长有常得仁、陈让卿、李国桢、魏文元、杨信五等人。大多系技正或技士兼任。我是技

士兼推广股长，具体管理各区、处有关业务事宜。

解放后的遂宁棉场，除场属各推广区、处人员划归所在县人民政府接管外，场内只选留十人，我也在被留用之列，新任场长为宦毓棠、周承懋二人，主管全面事宜。后因工作需要，又在南部县成立分场，从事试验研究工作，並先后招收农校毕业生和接收公安干校学生及保送的植棉能手共约100多人，由西南军政委员会农林部在场内成立植棉技术指导小组（简称植棉小组），交由棉场培训后，分发到川北各产棉县负责植棉技术指导推广事宜。並由棉场具体领导指挥，以专责成。另外，为了加快繁殖推广德字棉良种，由场在遂宁桂花区、蓬溪蓬萊镇及射洪太和镇等地，分别成立良种繁殖区，划定一定面积，供给棉农种植的良种，还自行购置轧花机，负责良种轧花，达到保纯。1953年底遂宁棉场与简阳棉场合并后，良种繁殖区也随之撤销了。

从植棉历史及自然条件来看，遂宁成为当时棉花试验研究及技术推广的开拓基地，有其必然性，据1935年出版的《四川农村经济》记载：“四川棉花大市场为遂宁”。棉田“偏于涪江流域”，著名的产棉县有遂宁、三台、射洪、蓬溪、中江、乐至等县。另据1980年四川棉花区划及布局的调查报告指出我省主产棉区呈一狭长的带状分布，从巴中经南部、射洪、简阳至仁寿一线是这个地带的轴心线，主产棉区都密集在这条线上及其两侧，这是由于这一地带的自然条件，经过长期演变、发展而形成的结果。遂宁市所辖两县一区，均在这一范围内，无疑是全省棉花高产稳产的可靠基地之一。这可证明1936年在遂宁设置棉场，开始棉花试验研究和技术推广，有其充分的依据，是正确的。从建场至1953年的十多年中，遂宁棉场在棉花科研及生产上，主要作了以

下工作：

1. 肯定当时各地棉花推广种：解放前全省各地种植的棉种，普遍是中棉（即土棉），产量低，纤维短而粗，不适合机纺。1936年遂宁棉场成立后，首先进行陆地棉（当时叫洋棉或美棉）品种试验工作。从中鉴定出德字棉产量高，品质好，适合当地种植。1938年从河南省灵宝县引进大批德字棉种，分发到各地种植，成为当时及五十年代初的推广种。但由于各地原种的中棉，具有生育期短，适应性强，抗逆性强的特点，耕作管理粗放。而德字棉生育期较长，病虫害多，爆花迟，耕作管理要求精细，开始农民很不习惯，产量很不稳定，引起农民的普遍埋怨。甚至个别地方要殴打推广区的工作人员（如射盐植棉推广区柳树办事处）。经过几年种植后，逐渐对该品种有了认识，自愿乐于种植。棉场不断进行新品种引进试验，先后推出岱字棉、洞庭1号及川73—27等优良品种，代替了德字棉，至今德字棉已成历史名词了。

2. 宣传推广植棉技术：各棉区原来都是种的中棉，种植技术是比较低的，都是迟播、稀植、用肥少、治虫次数少等，因此产量不高。棉场建立后，推广新品种，必须推广相应的种植技术。场属各区、处主要依靠特约示范农户，对其供给良种，指导技术，以示范田为基地，宣传推广棉花增产技术。为了鼓励农民种棉，乐于接受植棉技术指导，遂宁棉场配合农民银行及产棉县合作指导室发放棉业贷款，必须先由棉场签字后，才由农民银行贷款，並会同县合作指导室监督发放。目的在于使贷款真正发到种棉户的手中。但由于旧中国的农村为土豪劣绅所把持，真正棉农获得贷款的很少。我曾于1948年到蓬溪、乐至等县办理过棉业贷款，曾受到种种困难，当时的遂宁《涪声日报》曾登载过。但由于政府不

重视发展棉花生产，只凭技术部门的宣传推广，收效是极其微小的。至1949年种植良种棉面积不到棉田面积的十分之一。而植棉技术改进也不多，成为限制提高棉花产量的主要因素。解放后帝国主义对我国实行经济封锁，为解决纺织业所需的原棉，政府大力推广良种，同时把解决技术指导、肥料、农药供应等具体问题，作为中心任务来抓。至1953年棉田面积扩大近一倍，中棉几乎绝种。

3. 培养棉花技术人才：解放前植棉技术人员都是由场长聘用，一朝天子一朝臣，谈不上培养人才问题。只有解放后遂宁棉场才做了大量工作。前面提到的植棉小组，由棉场负责培训并编印植棉浅说，作为统一宣传资料。当植棉季节終了后，又集中在棉场学习技术，次年植棉季节开始时，又回到各县去作技术指导工作。1953年遂宁棉场撤销后，植棉小组一律划归各县领导，多年来，不少人成了棉花技术骨干，在棉花生产上，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此外，遂宁棉场配合有关部门开展防治病虫害研究，也是一项主要工作，在解放前农药极端缺乏的情况下，上级派专人驻场成立病虫害防治研究室，从事试验研究工作。采取土农药、土办法防治病虫害，也取得了一定的效果。解放后川北行署在遂宁成立病虫害防治站，彼此相互配合，在防治病虫害方面，取得更大的进展。

综合上述，可看出虽然解放前就建立了全省棉花试验研究及技术推广机构，做了一些工作，但成绩不大，只有在解放后，由于党和政府的极端重视，棉花试验研究及技术推广，才有了新的突破。

一九八六年四月初

遂宁直接税办理情况概述

倪 镇

我国直接税开始时只征收营利事业、薪给报酬和存款利息所得税，以其直接课征于人的所得，不能将本身所负担的税转嫁他人，故称直接税。此税具有公平合理和量能负担两大优点，堪称良税，为最好的财政收入。其他如遗产税、战时利得税（我国称非常时期过分利得税）等，均以所得为课征标准，都属直接税范畴。

我国直接税管理机构，在中央为财政部直接税署（开办时为财政部所得税事务处，继改财政部直接税处），在省为财政部某省直接税局（开办时为财政部某省所得税办事处），省以下为财政部某省某市、县直接税分局（开办时为财政部某省某市、县直接税区分处）。其后接管营业税，一些大县也设分局。各分局辖属各县设有查征所，开始时只大县才准设立，未设查征所各县由分局派员巡回稽征。遂宁直接税分局是在一九四二年成立的，辖有安岳、乐至、蓬溪、潼南、西充等县，在接营业税后均设有查征所。历任遂宁分局局长的有顾行、廖俊、倪镇、廖维国等。

所得税开征日期，国民政府明令规定为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一日，由于时间紧迫，筹备不及，当年只开征了第二类中的公务人员薪给报酬所得税，其余该类中的其他从业人员薪给报酬所得税连同第一类营利事业所得税、第三类证券存款利息所得税，均推迟一年开征。

遂宁分局除开征上述范围的所得税外，还开征了遗产

税、非常时期过分利得税、财产租赁出卖所得税，又接管了印花税和营业税。各税开征日期和接管日期，按照规定，遗产税为一九四〇年七月一日。非常时期过分利得税，原规定为一九三九年一月，实际开征为一九四〇年一月，财产租赁出卖所得税为一九四三年一月。接管日期印花税为一九四二年七月，营业税为一九四二年七月。另外，还在一九四四年接管了土地税和契税，以后这两种税和营业税又交还了地方，以其原是划归地方征收的。上述各税遂宁分局是分别按照规定日期进行征收的。

关于税务推行情况，由于在开征前宣传和准备工作做得比较细致、广泛和深入，调查商情和登记纳税单位、帐据等也做得比较好，直接税本身又是一种良税，加之税务人员都是大学、高中毕业经过考试训练结业的，对税法比较熟悉，还具有会计、审计等与查征税收有关的学识技能，而大多又清廉自持，不徇私情，查征税款多能作到实事求是，公平合理，很少过去税吏的积习，在工商企业中享有较高的威信，社会观感较好，当地政府又能从旁大力协助，所以税务推行还是顺利的。不过在接收营业税人员初期，在整顿税收队伍过程中，也发生过令人不愉快的事件，如在廖俊长局期间曾发生过因师管区枪杀新兵李光扬之母，引起群众怒毁师管区、直接税局事件，但旋由商会出面修复，照常纳税，风潮迅速平息，局商间亦较过去融洽，（编者注：据市中区税务志，遂宁捣毁直税局事件，先后曾发生数起。）税收逐年增多，这对于抗日战争胜利是有贡献的，同时也可说是遂宁分局纳税人的一种爱国热忱的充分表现。

一九八六年三月于成都

民国时期射洪的货币贬值

张 崇 福

我国历来使用银本位，以银铜为主的硬货币。抗日战争前夕，国民政府的财政预算，连年出现赤字。加之国际间货币贬值，国内经济衰退，农村经济破产，工商业日趋不振，币制紊乱，国民政府于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十一月三日，进行币制改革，规定从十一月四日起，以中央、中国，交通三银行所发行的钞票定为法币，所有完粮纳税及一切公私款项收付，概以法币为限。法币的发行，结束了我国几千年以硬货币为主的货币制度。当时人民咸称便利，一百元硬币掉换法币还得贴水近五元。

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国民党军队纷纷败退，国民政府迁都重庆，辖区缩小，军费浩繁，政府收支悬殊极大，便大量发行钞票，导致了物价飞腾、通货膨胀的后果。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政府于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七月发动反共、反人民的内战，军费支出倍增，法币开始崩溃，后来的金元券贬值更甚于法币，银元券也未能挽救其垮台的命运。

以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法币发行十四亿一千万元为基数，到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八月，增发法币三百九十四倍。到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八月，增发四十七万多倍，发行量增至六百六十三万六千九百四十六亿元。法币面额增为一百元，一千元，十万元到千万元。

随着法币的猛增发行，全国各地物价飞腾，根据当时射

洪县政府物价调查资料统计：民国二十六年中熟米每市斗为0.59元，到民国三十七年一月为85000元，面粉民国二十六年每市斤为0.06元，到民国三十七年一月为9000元，鸡蛋每个民国二十六年为0.13元，到民国三十七年一月为18000元。棉花民国二十六年每市斤为0.23元，到民国三十七年一月为45000元，猪肉民国二十六年每市斤为0.15元，到民国三十七年一月为13000元。以上几种物价增长，均在一、二十万倍以上。射洪县银行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成立时的三十万元股金，到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仅折合大米三市斗多。但民国三十七年一月到八月物价上涨速度更为惊人。

法币由于面额增大，物价猛涨，而一万元以下的钞券，民商携带买卖都感不便，对此发生厌恶，甚至拒用。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十月三十日，射洪县政府训令称：“……查五元，拾元，二十元，五十元之小钞法币，並無明令停止使用，近有不肖人民拒绝行使，妨害币政，特属不合，除电令各乡、镇，市布告行使外，合行令仰，该处即便遵照，立即将市面小钞法币，尽量设法掉换，汇送太镇国家银行换取大票，以杜纠纷，切勿违误为要！”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八月十二日，太和镇商会函请成都中央分行称：“径启者，近闻报载：成都市区已将不通用之一、二千元小钞尽量收兑。而各县市小钞充斥，行使困难，纠纷百出，不惟影响市场，亦使法币信誉减色，本会为协助维持地方秩序计，为代表商场痛苦计，未便缄默，爰于本月十二日，在本会大礼堂，请得本市有关机关法团首长，开临时座谈会，经众议决，应请成都中央分行，立运大钞两百亿元来太，以安地方，而维市场……。”省、农银行两办事处，对法币小钞收兑寄存，后由中央银行成都分行，派办事员石汝栋来太和

镇，由省银行太和镇办事处，商请法院及商会、银行同业公会等指派代表，于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八月八日，在迎春门外，水浒宫大坝火焚销毁一百元至四百元小钞计贰亿柒千柒百玖拾万元。这次销钞费用却用去壹亿贰千伍百多万元，占销券总额的一半。再后又于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九月十五日奉中央银行成都分行函，就地销毁二千五百元以下之小钞计三十八亿一千二百二十四万元。由于法币剧烈贬值，物价瞬息万变，民间大多采取以物易物，或使用少数银币交流。到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八月十九日，国民政府公布“总统财政经济紧急处理办法”从即日起废除法币，以金元券为本位币，法币以三百万元折合金元券一元，进行兑换。法币贬值，劳苦大众深受其害，当时民间流传一付对联，上联是：“人民流汗，一滴汗，两滴汗，千万滴汗”。下联是：“法币加圈，三个圈，四个圈，七八个圈，”生动地勾画出法币贬值，危害人民的凄惨景象。金元券发行之初，辅币奇少，其间铜币，镍币重行流通，其比值为铜币一文等于金元券一分，法币三万元。镍币五分等于金元券五分，等于法币十五万元。镍币一角等于金元券一角，等于法币三十万元。但市场仍无法调剂，有用草纸、火柴，针线代替找补等情事。射洪县工商两会，经银行同业公会函准，于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十一月六日，发行金元券欠条，暂作找补行使，限太和镇市区流通，积成五十角向两会所设兑换所，掉换金元券五元。后由射洪县银行负责，商会监督，太和镇互益文化社，先后两次印发“辅币周转券”二角、三角、五角三种，共计金元券八万九千八百五十元。此项“周转券”在物价急剧飞涨下，失去效用，由县银行陆续兑换收回，于民国三十八年（1949年）六月三日，约请党、政、暨

机关法团，县长吕嵩云，议长邓泽民，法院院长洪子镜等在县府公开铡毁。

金元券发行不到十个月，贬值速度更甚于法币，发行额增加六十五万倍，而批发物价上涨一百二十万倍，金元券贬值二亿五千万倍。射洪县猪肉价格，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九月份为金元券二角五分，到民国三十八年（1949年）六月份为七百万元，上涨二千八百万倍。大米每市石价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十二月为金元券一十五元，到民国三十八年（1949年）六月为六千三百四十万元，七个月内上涨四百多万倍。

由于货币不断贬值，射洪县各家银行，不得不采取货实收实办法，以保资金安全。並使用对内、对外两套帐簿，对内记实物和银元，对外记金元券，以应付上级。县内税征一律以中熟米为准，以当日米价折缴，各机关员工薪资也以实物为标准，按当时价格折币发放。民国三十八年（1949年）六月九日，美丰银行太办处，信字第（31）号函称：“太镇近来币制加速贬值，影响物价猛涨，各种货物蓬盘交易，均改银元计价，或实物掉换，金元券变为零星找补尾数，已临最后崩溃之境，此间六月六日各地运来大批现钞，抢购银元，当日上午银元价每枚约一亿六千万元左右，殊转瞬间，陆续抓涨到伍亿元以上，並闻有六，七亿元之价尚难买进。因此影响物价飞涨，一般商号及小贸无法计价经营，故到下午全市停业、拒用金元券，七日上午仍为停市，午间经商会开会，暂商维持办法：“各种货物一律以银元计价，零星找补以镍币、铜元为辅币。流行镍币拾元作银元一元，大二百铜元以二百枚作一元，小二百以四百枚作一元。”

在此景况下，偏居广州的国民政府，于民国三十八年

(1949年)六月二十二日宣布，金元券停止流通，以银元和银元券作为国家货币，金元券以伍亿元兑换银元一元，一张数以万计面额的金元券，换不回同等大小纸面的手纸。

银元券在射洪县普遍遭到拒用，农民银行太办处太字第19号代电称：“重庆行公鉴：太镇市面一切收支均为硬大洋，尚无使用银元券习惯，寄来汇款均须支付硬大洋，实在无法应付……。”民国三十八年（1949年）太字第59号函向成都农行称：“太镇银元券，除缴税外，市场拒绝使用，现因过境部队频繁，以致银元券充斥市面，射洪县府，求推卸责任，布告全县由属处，省行，邮局兑换……。因此过境部队及当地人民，持币前来兑换者，络绎不绝，纠纷层出，应付万分困难，为恐查银行库存，属处保存现有银元三千元，准备以二千元调奉钧处，一千元作为同仁临时应变费……。”

到了此时，国民政府军事失败，政治紊乱，经济崩溃，民心失尽，民国政权也就同银元券一起宣告结束。

许多学者专家，提出过不同的生动比喻，有人以上海米价计算过，民国二十六年六月，每石米价为法币11.05元，到民国三十八年五月二十一日，每石米价是金元券四亿四千万万元，也就是法币一千三百二十万万亿元，比民国二十六年六月上漲一百一十九万亿倍。如果每石米，以三百二十万粒计算，则购卖一粒即需金元券一百三十七元，折合法币十亿零一千一百万元。这次恶性通货膨胀的货币贬值程度，乃是国民党政府创造的唯一的世界第一纪录。真是日暮穷途，人间何世。如此的政权，它的结局也就可想而知了。

一九八六年四月二十四日

遂宁城关中、西药行业概况

贾俊祥

我县属浅丘陵地区，位于涪江中游，水陆交通发达，气温适宜，药材资源较为丰富，是名贵中药材——白芷的家乡。在沟渠纵横、丘陵起伏的乡区，野生药材随处可见。其中：河沙、联盟的半夏，唐家的白芨，南北坝的香附，尖峰坝的粉葛，三家的软前胡都各有其特色。

民国时期，饼街、铁货街、兴隆街曾先后设为中药材市场，药农们把采挖的药材上市出售，但最多的还是白芷，常年上市量100万余斤。后因法币贬值，种药利微，到解放时仅种白芷、荆芥、蒺藜、川藿香等几种。

药材产地遍及国内外，质量、规格、等级繁多。旧时各地区的各行各帮都各自订有复杂多样的银货折扣行规，业外人插手掺营较少。当时物价又相对稳定，经营中药材的行家们感到稳当有利，故择药行全森荣、复源祥、同义昌、同心德、永昌益、永泰长、福泰和、永昌祥、永康祥、荣昌隆、荣泰昌等相继于清末、民国时期开业。民国三十七年，城关共有择药行十五家。另有经营品种不多的味味子，如：一诚生、大通等几家。还有裕兴德、集中、同福等药材行栈，办理外来客商代购、代销、代储、代运、代办食宿、收取费佣、並兼自营。

择药行为了招徕顾客，采取赊销，以三、五、八、十、腊月为收款关期，並派人到县内外拉生意，上至中坝、广、旺，下至铜梁、合川等地推销，促进了咀片业的发展。

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十一月二十日经营原生中药材运销的择药行、咪咪子、药棧等筹组成立了“遂宁县国药业商业同业公会”，咀片铺也相继成立了“遂宁县国药业工业同业公会”，选举了各自的主席、常委、监委、候补委员，都制订了同业公会章程，以维持增进同业之公共利益，矫正同业之弊害为宗旨。继于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两个公会又都改选了第二届公会负责人，直属遂宁县商会。

从民国元年至民国三十八年（1912—1949）城关咀片铺先后计有永寿春、全泰堂、六安堂等79家，其中有些是夫妻商店，都是前店后厂，把上乘饮片选作另称另包，去逢迎有钱、有势的买主。边角次品，刨成薄片，抓给一般病人，碎末尖尾，碾面配制丸药出售。计量是用16两一斤的等子秤，一般是十两为本的利润。在柜台上放个罗汉，以示吉利；中间挂穿山甲一张，上写：“铜甲将军”；两边挂药名的对联如：“大将军骑海马过常山谨防滑石；小红娘牵丑牛耕熟地需要细心”。又“日饮熟地首乌长生不老；早服枸杞蜂蜜永远康宁”等对联。

西药房是民国三年（1914年）后的新兴行业，1907年美、英等国来遂修建福音堂传教，才传入了西医西药。继于民国二年（1913年）在西门外建成博济医院，因收费较贵，一般群众仍习惯请中医服中药。

民国三年（1914年）有个别医生护士在遂开业卖西药，兼行外科手术。继而华泰、华益、永昌等十三家西药房先后开业，都自配十余种家用成品药，兼营香精、雪花、糖精、奶粉、罐头等。

由于国民党政府横征暴敛，八年的中日战争，三年的内战影响，中药材与西药进销业务，日趋衰落，幸存者大改

小，小则溃。到1949年时，只有择药行九家，咀片铺35家，西药房七家了，他们都处于奄奄一息状态。

旧社会的行号店主们，都是低价雇请工人，以带学徒为主。学徒请人保荐，投师字约写明：必须服从安排，风寒暑湿，天灾人祸，听天安命。晚抵铺门睡，早起搞清洁，烫烟杆，三年没工资，每年只有粗布衣服一套。成天抬药，翻晒药，清选、烘、薰药，切药、碾药、炒制药，没休息时间，整天在药材灰渣里生活。平时吃咸菜豆芽饭，每月吃肉二次（初二、十六打牙祭）。老师们根本不教学徒业务知识，只有靠自己深夜钻研和请教师兄们指教。一般在药材帮学徒的都家境清寒，才能坚持忍受。曾有人说：“前世作了恶，今生学择药”。

建国后，国家对私营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通过三、五反及各项社会改革运动的教育学习后，私营中新药各店号的从业人员，坚定了：“听共产党的话，跟共产党走，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决心，于1956年6月批准了全行业公私合营。

为适应各个时期的客观需要，国、合营分分合合，隶属几经异变，于1979年12月29日成立了“遂宁县医药管理局”，从此遂宁县中药材公司与遂宁县医药公司，隶属于遂宁县医药管理局。

中药材公司与医药公司在上级党政领导下，贯彻了党的“医药下乡为五亿农民服务，支援农业生产”的指示，积极协助区社建立批发网点，大力宣传中新药品的疗效、性能、服法、禁忌知识，培训中药材的栽培、收购、炮制加工技术人员，开创了中药材生产基地，发展了枳壳、川芎生产，搞红花科研。1977年—1979年我县家种药材收购量大的有35种，野

生检拾药材有122种，1981年与1982年我县中药材公司经省中药材公司与绵阳中药材站评为先进集体与先进科研集体。医药公司经省医药公司与省商业局评为先进集体。

1980年—1984年中药材公司先后派出采购174人次，参加药交会75次。调济余缺，经营品种由1980年的520种增加到1984年的590种，中成药由1980年的250种增加到1984年的416种；紧缺商品由1977年的150种下降到1984年的60种。医药公司亦专人奔赴各省、市联系采购短缺品种，满足了市场供应。

中药材公司在二井沟设有制药厂，中药店在顺城街设有加工房，都按省司“炮制规范”加工炮制，把原生药材浸润后切片、切节、捣碎、碾粉后，再进行清炒、沙炒、麸皮炒、米炒、土炒、沙烫、蜜制、酒制、醋制、盐水制、姜汁制、煮制、制霜、焙制、石灰制等二十余种方法，分别进行炮制加工后，分发到门市配方。经炮制后的药材偏性与臭味得到了矫正，且易于熬出药效。

迄今为止，我医药系统共有职工325人。其中：大专生二人，中专生17人，高中生35人，他们都正在各自的岗位上发挥作用。

我们坚信，沿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的正确路线继续奋斗，我们的医药事业，必将获得更进一步的发展壮大。

一九八六年六月十日

老药工漫话今昔

唐国卿

(一) 一生的经历

我于一九三三年求亲戚介绍到遂宁县秦家择药行学徒弟，到今已有五十余年的岁月，经历了两个不同性质的社会。回顾国民党统制时期的药工生涯，至今仍历历在目，记忆犹新。旧社会学徒弟二十四孝不行，要三十二孝才学得出个徒弟。学艺维艰，可以想象。根本没有什么自由，俗话说：“徒弟、徒弟、三年奴隶”，投师文约上明确规定：行船走水、风寒暑湿、天灾人祸、听天安命，更谈不上生活福利保障。天明即起，二更摆抵门床睡觉，一年中只有端午节半天，春节两天的休息，有什么假日和探亲呢？学徒期间，除了三顿豆芽饭，初二十六打牙祭外，按规定是没有工资的，家庭贫穷的只有脚穿破草鞋，腰围烂麻衣。二、三年的徒弟，可以支少量的钱剃头、洗衣、买草鞋。出师后，需则雇用，不需则听其自便，工资极其菲薄，只能维持一个人的简单生活，平时东挪西借，算盘一响，眼泪长淌，时刻有失业的威胁，毫无工作保障。如果体弱多病，年老无依靠时，只有住破庙，栖桥脚，死于非命者，不乏其人。我所知道的遂宁县就有：管厚之、王孔明、袁汤元、陶友三等人，走到了这条绝路，他们并非庸才痴汉、而是技艺高尚，能文善贾的行家。处在黑暗社会里，何处去寻仁人君子激发善心提携他们呢？千言万语，归根到底，是旧社会剥削阶级所造成的恶果。只有彻底砸烂资产阶级总机器，建立无产阶级政权，才有被压迫人民